

2021

The Somaesthetics of the Multitude: The Politico-Aesthetic Logic of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in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hood

Jinying Li
675441047@qq.co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Jinying (2021) "The Somaesthetics of the Multitude: The Politico-Aesthetic Logic of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in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hoo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Vol. 41 : No. 2 , Article 21.

Available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1/iss2/2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s.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s.

诸众身体美学

——奈格里和哈特构建主体的政治-美学逻辑

李缙英

摘要:“诸众”是奈格里和哈特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体”之后重构的独一性与共同性统一、身体性与情感性兼具的概念,是推翻“帝国”控制并建构“大同世界”的后现代社会的主体。而奈格里是从艺术与诸众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来探讨社会问题的,从这种视角来看,我们可以将其推行“诸众”理论的逻辑概括为美学化的、“生命政治化”的,其内在的理路可以概括为从诸众的“身体美学”到“身体诗学”,再到“身体/奇异性政治”的过程。

关键词: 诸众; 身体美学; 奇异性; 美学化; 生命政治化

作者简介: 李缙英,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通讯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西路180号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学楼264209,电子邮箱:675441047@qq.com。本文系第6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共同体美学’研究”[项目编号:2019M662387]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项目编号:16ZDA19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Somaesthetics of the Multitude: The Politico-Aesthetic Logic of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in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hood

Abstract “The Multitude”, a concept reconstructed by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after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hood by post-structuralism, is a combination of singularity and commonality, and physicality and affection, and it is the subjecthood of postmodern society that overthrows the control of the empire and constructs the commonwealth. In the early days, Negri began to explore social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the multitude. From this perspective, his logics in constructing the multitude can be summed up as aestheticization and bio-politicization, and its inner trajectory of reasoning can be summarized as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omaesthetics of multitude” to the “poetics of body”, and to the “body/singularity politics”.

Keywords: the multitude; somaesthetics; singularity; aestheticization; bio-politicization

Author: Li Jinying, Ph. D.,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Address: Literature Building, Weihai Campu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180 Wenhuxi Road, Huancui District, Weihai 264209,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Email: 675441047@qq.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9M662387) and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16ZDA194).

一、从抽象艺术到独一性的“诸众”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和美国文学理论家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的“帝国”(empire)理论,是在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构建起来的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而“诸众”则是他们构建的抵抗“帝国”的主体理论。所谓“诸众”(multitude)是指其内在性

平面的杂多性(multiplicity)不可被化约为同一性或统一体的独一性的主体,是涉及身体性与情感性的主体,是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的主体。

在探究“诸众”概念及其生成机制和推衍逻辑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诸众”概念的谱系。“诸众”一词可以追溯至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其中,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对“诸众”的阐释影响较大。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在《诸众的语法》中采用了比较斯宾诺莎的“诸众”与霍布斯的“人民”概念的方法,还将美学、语言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理论当作谓语,以此研究作为主语的诸众。维尔诺将诸众建构为一种包含顺从与抗争、奴性与自主的双重性存在模式,并将其看作公民自由的基础以及分析公共领域的工具(维尔诺23—30)。

奈格里和哈特也采用了比较“诸众”与“人民”“大众”“工人阶级”等社会主体概念之间的差别的方法。他们对“诸众”概念的创造性阐释不仅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理论、维尔诺的语言学方法相关,还涉及马克思、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等理论家的理论。在《狄俄尼索斯的劳动》(*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帝国》(*Empire*)、《诸众》(*Multitude*)、《大同世界》(*Commonwealth*)、《集会》(*Assembly*)和《宣言》(*Declaration*)等论著中,他们逐步塑造出涉及经济、军事、政治诸领域的奇异性的、生命政治化的诸众概念。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诸众”不仅是从事非物质生产的社会化工人,还是从资本导致的剥削共同性和新异化状态中“出走”的“世界主义工匠”(cosmopolitan bricoleurs);既是“去身体化”的战争机器,又是“再身体化”的“生命政治士兵”;既是全球资本主义统治(即“帝国”)的控制对象,又是抵抗“帝国”并构建“诸众民主”和“财富共有”的“大同世界”的“平民/共有者”(commoner)。

关于“诸众”概念,有学者指出哈特和奈格里故意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譬如他们搁置了作为政治主体的诸众是如何构成自身的这一问题,而且关于诸众构成的事件也缺乏范例或模式,因此显得过于诗意而暧昧(Nicholas and Szeman 372—

373)。其实这一评价是失之偏颇的。如果将奈格里关于美学理论的探讨纳入考察范畴的话,就会发现构建“生成-诸众”的逻辑可以在他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美学研究及其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中追溯本源,而且“诸众”以及“诸众政治”也是通过艺术、美学理论和美学化的逻辑而构建和推衍出来的。^①

关于奈格里美学研究的重要论述可以通过《艺术与诸众》来考察。该书是奈格里致友人的书信的合集。他与卡洛·福尔门蒂(Carlo Formenti)、曼弗雷多·马西罗尼(Manfredo Massironi)、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西方艺术家以及理论家,探讨了20世纪中后期以来欧洲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美学本质等问题。在这些研究和讨论中,奈格里通过对抽象艺术的生产,对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崇高”“介入”“物质的变形”以及“斯宾诺莎主义”等概念进行美学研究,阐释了“诸众”“独一性/奇异性”(singularity)^②和“共同性”等概念。

奈格里关于诸众的美学理论可以概括为“诸众身体美学”和“诸众情感美学”:前者是通过艺术的“物质变形”来解释后现代社会主体的“身体”(crops)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而后者则是通过使用后现代主义话语重新阐释“爱”和“情感”后创造出来的“斯宾诺莎主义”概念,以探讨抽象艺术中的情感、欲望和伦理的革命性意义。为了避免同时探讨身体美学与情感美学可能导致的混乱,本文将暂时搁置“诸众情感美学”,而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物质变形”和“身体美学”出发来追溯奈格里以及哈特构建诸众概念的政治-美学逻辑。

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奈格里首先阐释了抽象艺术与诸众的关联性。在奈格里看来,艺术是发明独一无二形象和独一无二对象的劳动。在艺术的运动中,主体的潜能被安置于主体的深化认知与重新发明世界的的能力中,因而唯有当艺术用来表达自身的符号和语言变成商品并被共同规划所包含和容纳时,才能实现“美”和绝对。而作为独一性发明的美在参与世界建构的主体多样性的过程中不断循环并揭示自身,由此美变为一种能够成为行动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就是诸众(奈格里 xvii-xix)。换言之,奈格里通过美即独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推导出具有独一性和多样性特征

的、参与共同性和生成性实践的主体就是诸众。

其次,奈格里还在探讨1990年前后的西方艺术时探讨了艺术“物质变形”与诸众肉身之间的关联性。在他看来,“身体”是一种认知力量、强力意志和新潜能,而艺术的“物质变形”或“身体变形”不仅是艺术质料对世界之肉身、社会身体的表征与再现,也是关于身体内部的认知的转变。在后现代的今天,人们已普遍承认身体是世界全部构造的中心、终点和目的,而且身体不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也是艺术生产的主体,因而奈格里认为,身体是一台机器,既铭写生产,也铭写艺术。他还指出,不仅艺术是生产性的,艺术中的肉体性、伦理性因素本身也具有可再生产性。从艺术符号是对世界之肉体、欲望的表征、再现和表达这一观点来看,艺术的生产性也就是对世界之肉、人类之欲望“增生”的寓言。据此,奈格里推导出艺术与生产、生产者之间的逻辑性关联:当劳动力是认知性的时候,艺术表达的欲望就会揭示自身并呈现出一种生命形式,而工人大众在把自身转变为单一劳动者的诸众时,也像艺术生产一样再现了世界之肉(奈格里 75—109)。在此基础上,奈格里将身体与艺术联系起来推导出肉身化的、单一性的诸众。

从推衍诸众概念的机制来看,奈格里是通过抽象装置(dispositif)的相似性,也就是在表征、再现、想象与实践的关系层面上推导出艺术与诸众之间的关联的。这种推衍的逻辑是抽象化的、美学化的。再从构建诸众概念的理论资源这一视角来看,如果奈格里是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物质变形”中推衍出一种肉身化的诸众概念,那么他所建构的诸众理论也就是关于诸众的肉身性的美学。

可以说,奈格里推衍诸众概念的逻辑是“美学化”的,或者说是“身体美学化”的。但是,从形而上学层面来看,这种诸众概念是否是一种以“身体一元论”取代传统“感性学一元论”的逻辑陷阱呢?诸众身体美学本身是否存在着过度强调肉身性而忽视理性、实践性的倾向呢?

二、从艺术生产到“生命政治化”的诸众生产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追溯推衍诸众概念的逻辑时,除了可以发现美学化的逻辑,还可以发现“生

命政治”理论以及“生命政治化”逻辑对奈格里和哈特理论的深刻影响。所谓“生命政治化”是指他们借鉴福柯和德勒兹的“生命政治”理论,从主体的生命来探讨后现代(非物质)生产形式对诸众与政治、生产之间关系的影响。而从美学化逻辑和“生命政治化”逻辑之间的关系来看,诸众身体美学也就逐渐转变为一种“准政治”的、“生命政治化”的诸众身体诗学。

这种美学化的、“生命政治化”的逻辑为奈格里和哈特以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对奈格里和哈特来说,20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出现的“物质变形”,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发生结构转型的“前卫”或“先锋”。他们还将作为一种本体论经验的艺术活动看作一种考察诸种劳动形式的新视角,通过这种视角,他们从艺术“物质变形”与“生命政治化”诸众之间的联系中,找到了艺术生产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范式转型以及生产者转变之间的关联。

首先,奈格里通过艺术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的联系性探讨了后现代社会生产的“非物质”转型。奈格里对艺术体验的分析是与劳动转型模式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他还指出了劳动转型与现代主义艺术向后现代主义艺术过渡的时间大致相似:19世纪以来劳动变得愈加抽象化,而自1960年以来,劳动也经历了“独一化”的过程——劳动呈现出一个智力的、情感的、非物质的形象,一种生产语言和关系的形象。这种劳动的转型,也就是从价值的总体抽象到其具体表现力的非物质“独一化”(singularisation)的转变过程(奈格里 xvi-xvii)。在此,奈格里的逻辑关联可以概括为:从艺术领域来看,后现代主义艺术从现代主义艺术的抽象化转变为抽象本身;从社会生产/劳动领域来看,后现代社会的劳动从抽象化变为抽象的、独一化的非物质劳动。

所谓“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是由意大利理论家莫利兹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所构建的劳动理论,即“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拉扎拉托 139)。而“非物质”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所提出的概念,即产生于电子信息技术科学或电子信息技术科学之方法的技术。^③奈格里和哈特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

再阐释不仅借鉴了拉扎拉托的理论化界定,还借鉴了他从生产的“审美/意识形态”模式转换为社会学模式的逻辑,并通过艺术的“创生”和德勒兹的“生成”等生产性理论不断推导出新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在《诸众的历险》一文中,他们将非物质劳动概括为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象征性和分析性的工作、服务性和情感性的劳动,也就是生产非物质性产品的所有劳动形式(Hardt and Negri, “Adventures of the Multitude” 236-243)。在《诸众》中,他们将“非物质劳动”划分为涉及语言、符号等“普遍智能”的认知型劳动,以及涉及“妇女劳动”和“身体模式的劳动”的“情感劳动”这两种形式(*Multitude* 108-110)。此外,他们还补充了“非物质劳动”的复杂性内涵,指出这些生产形式都是符号、语言、信息的生产与情感的生产之间的结合,非物质劳动也总是与物质形式的劳动混杂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奈格里和哈特通过艺术生产的转变揭示了劳动向认知型劳动、身体性劳动、情感性劳动转变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状况。

其次,奈格里和哈特还进一步将美学逻辑、“生命政治”逻辑纳入他们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阐释中,使其成为“生命政治化”的劳动,并用这些逻辑来阐释劳动主体。奈格里认为,在抽象装置层面,可以根据后现代主义艺术所表征的“可复制性”和“可再生产性”推导出独一性的劳动主体的“可再生产性”。后来,奈格里和哈特一起根据这种抽象装置推导出社会生产者的生产装置/机制:从事艺术生产等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是心脑合一的、独一性与共同性统一的诸众,而诸众也在这些抽象的、独一化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不断生成自身。可以说,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后现代社会的新型劳动是一种生产或调控情感和肉体的、群体性或协作性的、“生命政治化”的生产方式;后现代社会的劳动主体是独一性与共同性统一的、“生命政治化”的诸众。从更高阶段的抽象形式来看,生命政治生产的最终核心就是主体性的生产。并且,根据他们推导诸众生成模式的逻辑“艺术生成-诸众”“身体生成-诸众”“情感生成-诸众”“生命政治劳动生成-诸众”)来看,这种主体的生成本身也是一种“生命政治化”的生产。

至此,奈格里和哈特通过一种较为严密的逻辑关系,从艺术生产的装置推导出关于社会生产

和诸众生产的“生命政治劳动”理论。

需要补充的是,奈格里和哈特更倾向于以“生命政治劳动”而不是“非物质劳动”来界定和命名后现代社会的劳动范式。而“生命政治劳动”是他们在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创新,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同时进行的,以人的生命、肉体、欲望和人口流动等来建构抵抗帝国“生命权力”的“生命政治化”的理论。

三、从审美救赎到“生命政治士兵”

如果说,奈格里和哈特的理论创新是试图在后现代社会的今天“解释世界”,那么这些理论是否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改造世界”的可能呢?

奈格里和哈特指出,在诸众的肉身中可以重新发现起义的经验,而诸众革命就是以诸众的生命政治生产为基础的合法抵抗(*Multitude* 68-69)。那么,这种肉身化诸众的抵抗机制从何而来?作为政治主体的诸众是如何生成自身的呢?其实,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追溯至他们对文艺的研究——前者与“审美救赎”相关,而后者与恶魔性的、非人的艺术形象相关。

首先,奈格里和哈特在解构“抵抗美学”的二元对立逻辑的基础上,发现了“审美救赎”的社会意义,并将其与斯宾诺莎的“内在性”理论相糅合,构建了一种另类性的、内在性的救赎与抵抗机制。

在奈格里看来,美及其对生命的超脱是一种面对后现代社会存在之撕裂的超脱以及重建集体经验的另类可能,而艺术劳动就是人类呈现超脱之存在的能力,是解放了的劳动。所谓“解放了的劳动”意味着一种由欲望而诞生并摆脱剥削、异化、奴役的劳动,即欲望和自由能够超脱于抽象劳动的整体并发展出新的意义。所以,奈格里将美看作一种产生于劳动的创造性潜能,一种集体性劳动所建构起来的超脱(奈格里 43-49)。但是,并非所有政治性的艺术或美学都是正确的,奈格里就对“抵抗美学”提出了质疑:一方面,他在解构文艺作品中的抵抗与对立主题的基础上,揭露了“抵抗的美学”及其背后的二元对立逻辑。他通过分析德裔瑞典作家彼得·魏斯(Peter Weiss)的小说、戏剧中的抵抗美学,以及德国女导

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电影中所展现的具有“纳粹美学”的礼拜仪式等,揭示了这种“抵抗美学”的去神秘化与好斗的本质;另一方面,奈格里从话语层面揭示了“抵抗美学”理念只是一种话语狂欢——人们在非此即彼的辩证法逻辑下创造了一种人类能够控制现实的想象。因此,他提醒我们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模式中,并提出一种超越抵抗美学的二元对立的另类选择,即身体抵抗。这种另类选择来自斯宾诺莎,他认为内在化的抵抗才是摆脱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奈格里主张通过身体来颠覆“超现实主义”的谵妄和解构主义的虚无,甚至重新创造和发明新的生命和身体。

从奈格里和哈特的理论阐释来看,这种“另类性”可以概括为超越二元对立的、内在性的、“精神分裂症式的”。^④但这种审美的、内在性的救赎机制仍然显得过于浪漫化。那么,是否具有更加形象的革命主体呢?或者说,救赎和抵抗的革命主体是如何构成自身的呢?

其次,为了进一步探讨更加形象化的政治主体,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和《诸众》中考察了西方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等领域中的“傀儡”“附魔人”“吸血鬼”等“怪物”和“非人”形象,并通过这些具有颠覆既有秩序之潜质的隐喻性主体形象,来探讨主体在身体和身份层面的革命性潜能,以此构建作为政治主体的诸众。在他们看来,犹太教“勾勒姆/傀儡(Golem)寓言”中塑造的战争怪物喻示了暴力所导致的永恒战争与无区别毁灭《新约》的“附魔人寓言”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被附魔的俄国民众,也揭示了魔鬼般的诸众所具有的颠覆既有秩序和规范的、超常的“恶魔性”力量;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出现的“德库拉伯爵”到现在影视剧中风靡一时的“吸血鬼”,都因其啃咬和“传染”等具有替代性作用的繁殖机制而成为色情意味强烈的、无节制的、破坏性的另类形象……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不仅“美”是一种超脱、革新和解放了的自由,“怪物”和“非人”更是一系列充满抵抗意味和政治隐喻的艺术符号。他们通过分析这些“怪物”与“非人”,为诸众赋予了恶魔性、怪异性、肉身性、另类性的特征以及颠覆性、暴力性的革命潜质。

在这些革命潜质的基础上,奈格里和哈特探讨了如何将革命潜能纳入建构的机制,即“生成-

诸众”的机制这一问题中。他们认为,诸众斗争发生于生命政治领域,斗争能够直接生产新的主体性和新的生命形式,因而诸众斗争总是涉及主体性的生成(*Multitude* 83-84)。而主体性的生产本身也具有混合性、杂交性和调节性的特质。^⑤因此,他们将后现代社会的政治行动的关键界定为对主体性生产的控制或自治,也就是诸众在构筑共同性的过程中将其自身构建为奇异性的主体性的过程(哈特 奈格里 序言 3-4)。而且,诸众的主体性生产过程是不间断的集体性自我改造的过程,也就是从“是/成为诸众”转变为“制造诸众”。这种“制造诸众”就是一种奇异性与共同性统一的、构成性的、自主性的、“生命政治化”的过程,也就是一种斯宾诺莎意义上的“构成本体论”(constituent ontology)(Negri, *The Savage Anomaly* 130-136)。

如果说,奈格里和哈特从艺术生产推导出诸众生产是在抽象装置层面构建了一种后现代社会的劳动主体的话,那么以“生命政治化”的方式来“制造诸众”则是试图在社会层面构筑一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主体。而且,由于主体在生产以及生产自身的本体论过程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autonomy)(Hardt and Negri, *Assembly* 117)这些过程也就是一种所谓“诸众生成-君主”(the becoming-prince of the multitude)的过程。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诸众不是传统的中心化主体,而是一种重组的杂合体,一种涉及人类与机器的本体论关系(the ont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的“赛博格主体”或“机器主体”(machinic subjects),一种被看作信息处理实体的、类似于智能机器的后人类主体。^⑥

他们创造的“生命政治士兵”概念,就是后现代社会、“后人类主义”的诸众在革命或军事领域的变体;而“诸众”则是包纳“生命政治士兵”的社会主体。奈格里和哈特将那些在后现代军事变革中“去身体化”(decorporalized)的“战争机器”,转变为“再身体化”的“生命政治士兵”,并将这种游牧性的士兵看作从“帝国”控制中逃离的“逃逸线”。2019年上映的科幻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中的“阿丽塔”,可以说是“生命政治士兵”的绝佳演绎。改造人阿丽塔拥有人类的大脑、情感

和直觉,还拥有符合人类审美的标志性大眼睛,她的心脏由反物质微型反应堆驱动,拥有高科技战争装备和“机甲术”,还拥有数字化、信息化的网络装置。阿丽塔不仅是生命政治化的人工智能的战争机器,更是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乌托邦奇异”意义上的后人类隐喻。从詹明信的科技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寓言,而科幻是将寓言推衍到后人类的未来这一观点来看,“诸众”以及“生命政治士兵”是奈格里和哈特对后现代政治主体的寓言式演绎,或者说,关于诸众的乌托邦想象就是探索后现代的破碎主体重建自身的手段。这种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主体也就是一种奇异性的乌托邦,一种作为乌托邦的奇异性形象——而从这一视角的消极层面来看,这些关于后现代主体的理论只是一种从“审美乌托邦”出发的审美解放话语。

那么,这种诸众理论除了可能导致虚无主义、机会主义(opportunism)和犬儒主义(cynicism)等倾向之外,是否存在积极的革命潜质呢?

四、“奇异性政治”

为了进一步建构积极的诸众革命理论,奈格里和哈特通过文学艺术探讨了社会层面的身体(即“身份”)所蕴涵的革命潜质,并推导出“消除身份”的“诸众身体政治”的谋划。

在《大同世界》中,奈格里和哈特考察了文艺作品中的“穷人”“农民”“移民”“无业游民”等,并通过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产业后备军”“流氓无产者”等概念,重新界定了这些身份在政治、经济和革命层面的意义。他们还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美学”等理论出发,将这些身份中体现出的游牧性和不确定性看作救赎与抵抗的潜能,将他们的逃离、游走、通勤等行为视作“解域化”的抵抗实践,并将他们追求安全、自由、财富与幸福的欲望看作一种积极的、颠覆性的革命力量,而将共同性的情感、感受和情绪作为群体性革命(即“情感革命”)的基础。奈格里和哈特不仅将这些处于现代社会边缘性地位的身份抬高至“后福特制”经济的生产主体的地位,而且还主张以诸众来取代具有不同等级的身份差异的劳动者。为了达到“消除身份”并实现政治主体的独一性与共同性统一的目的,他们提出了通过抵抗、出走

(exodus)、耗空敌人力量以及构建新社会等方式来建构“身份政治”的筹划。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意识到传统的“身份政治”以及“情感政治”都存在着一定的悖论和局限。这是因为后现代社会的诸众形象是多样性的,后现代社会的革命关注的也是人类的共同性命运以及“后人类个体的内在多样性”,只有奇异性概念及其杂多性的转变才能实现后现代主体的“身份”解放(哈特 奈格里 240—241)。因此,他们提出以“奇异性政治”取代各司其政的“身份政治”和“情感政治”。那么“奇异性/独异性政治”具备哪些特征呢?第一,奇异性政治并不否认各种概念的有效性,也并不创造新的概念体系,而是在原有的概念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运作;第二,奇异性政治关注概念内部的多样性,在不取消彼此意义的前提下,生成叠加的或矛盾冲突的或和谐的共存性关系;第三,奇异性政治的目标是在共同性基础上建构“大同世界”/“共同体”,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⑦

在构建“奇异性政治”的过程中,奈格里和哈特借鉴了斯宾诺莎关于“平行论”的观点,并反思了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认为的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与性别斗争有着根本性差异的观点(Žižek 362)。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就身份政治的概念来说,存在着某种平行论。换言之,种族臣服的结构与性别臣服、阶级臣服等存在着某些共同要素,这就使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政治传统之间有了“转译”的可能。这些“转译”并不意味着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等级制之间没有差别,而是强调转译所依赖的基础即共同性。因此,三者是相互平行的。在“平行论”的基础上,奈格里和哈特发展出奇异性之间相遇和接合的逻辑,也就是治理革命的民主组织和民主决策的“交叉”的逻辑,从而确保该进程不被官僚制或集权化的组织所控制(哈特 奈格里 241—244)。他们还将这种“交叉”的逻辑与德勒兹的“块茎”和“游牧”概念相结合。这样,平行论的诸众革命也就衍变为一种游牧的、交叉的网络式斗争。“交叉的网络式斗争”的第一个特征是发生于生命政治领域,即这种抵御、攻击敌人的新力量能够直接生产新的主体性和新的生命形式;第二个特征是各种不同的斗争运动能够在共同性的基础上充分表达自主性和差异性;第三个特征是多层次的抵抗能够交

义、平行地进行,存在对民主的普遍性需求和欲望;第四个特征是以共同性的抵抗激情为基础和动力(*Multitude* 83-91)。最终,奈格里和哈特将“革命的平行论”推衍为一种不断摧毁、不断相遇、不断生成的“分布式网络”的组织结构和革命形式。

可以说,“奇异性政治”是一种从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游牧”推衍而来的政治理论,即后现代主体诸众平行地、交叉地开展共同性的身份政治和情感政治,采用交互网络式的形式抵抗“帝国”控制并避免集权带来的“腐化的共同性”,为构建“诸众民主”与“财富共享”的“大同世界”创造可能。

至此,奈格里和哈特实现了从美学的“物质转向”到“诸众身体美学”,再到“生命政治化”的“诸众身体政治”,再到“革命平行论”的、“交互网络式”的“诸众奇异性政治”的逻辑推衍和理论创新过程。

但是,许多其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诸众与诸众革命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最根本的就是对诸众的政治力量,也就是对诸众的奇异性能否以及如何政治性地进行集体行动的质疑。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指出诸众的内在性和多元性是阻碍其政治能力发挥的肇因。虽然他承认诸众存在的首要条件,即后现代社会领域已彻底变为异质性的这一判断,但仍认为政治行动需要一种主导性的霸权力量以“接合(articulation)”的方式将处于内在性平面的奇异性都“同一化”为统一体。他还坚信政治行动在根本上总是要成为对“人民”的建构,因而他将诸众视为通往统一性政治主体的过渡性角色,而非政治主体本身(Laclau 153)。应该说,这种批评指出了“奇异性政治”在现实政治、经济层面的混乱与无力。此外,其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质疑了诸众政治的立场和方向。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认为诸众概念缺乏确保其进步取向或反体制特征的内在标准,还指出诸众立场的两面性与模糊性可能会导向截然相反的政治选择(Balibar 3-38)。而齐泽克和阿尔·巴迪欧(Alain Badiou)则进一步推进了诸众的政治方向这一问题,认为诸众并非具有两面性而是会与统治的力量结盟。其中,巴迪欧指出对权力的反抗永远无法逃脱权力,诸众和反抗的筹划只是

权力自身的组成部分,因而关于创造性、反体制的诸众概念只是痴人说梦(Badiou 125)。这两位理论家在对马克思和福柯的理论进行创造性解读的基础上否定了诸众概念,却再次悬置了构建抵抗资本主义统治的主体的问题。

总之,奈格里和哈特构建诸众理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治美学化、“生命政治化”。所谓“政治美学化”是指用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物质/身体变形”和“斯宾诺莎主义”来表现政治现实,从审美救赎、审美乌托邦等方案出发为人们提供政治方案(田延 210—231);而所谓“生命政治化”是指以人的生命、肉体、欲望和人口流动等来建构抵抗帝国“生命权力”的“生命政治”筹划。这种美学化、生命政治化的研究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另类性的思维方式也为超越二元对立辩证法的简单化、重复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而诸众这种具有乌托邦意味的主体也为追求自由、民主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一种寓言/预言性的启示。

从理论传统与理论创新的关系这一视角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经典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是当代“西马”文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其中,探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西马”文论建构中的作用,如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西方“毛泽东美学”(Mao Zedong's aesthetics)建构中的作用(曾军 14—20),是目前文艺学领域研究“西马”文论的新视角之一。而除了重返马克思、重返现实,当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还要以能否为社会现实提供指导意见、解决方法或启示为评价依据。

注释 [Notes]

① 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提出的“奇异性美学”(the aesthetics of singularity)就是对奈格里和哈特“奇异性”概念的美学化阐释与理论界定。参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奇异性美学》,蒋晖译,《文艺理论与批评》1(2013): 9—17, 28。

② 哈特也探讨了德勒兹理论中的“singularity”。参见: Hardt, Michael. *Gilles Deleuze: An Apprenticeship in Philoso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59-63.

③ 1985年,利奥塔首次将巴黎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

和文化中心的一次展览会命名为“非物质”。参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物质》,《视觉潜意识》,王逢振主编,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53页。

④除了内在性的抵抗,他们还探讨了“另类现代性”(altermodernity)和“生命政治理性”等另类的概念。

⑤关于主体性的生产,奈格里和哈特借鉴了吉奥乔·阿甘本的《来临中的共同体》。详见:Agamben, Giorgio.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⑥参见Hardt and Negri, *Assembly*. 109-110. 在构建主体理论的过程中,哈特和奈格里借鉴了德勒兹、加塔利、凯瑟琳·海尔斯、唐娜·哈拉维的著述,如:Guattari, Félix. *Chaosophy: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2-1977*. Ed. Sylvère Lotringer. Trans. David L. Sweet. Becker, Jarred, and Taylor Adkins. CA: Semiotext (e), 2008; Hayles, Katherine.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Haraway, Donna.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⑦参见曾军《〈三体〉的“Singularities”或科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逻辑》,《文艺理论研究》1(2016): 84—93。该文在借鉴詹明信理论的基础上采用了“独异性政治”的命名,这是对“singularity”在政治和社会学层面涵义的强调,对于厘清概念的复杂性具有重大意义。但本论文旨在探讨构建“诸众”概念的政治-美学逻辑,因而并未完全按照领域或语境的不同而严格地区分“独一性”“独异性”和“奇异性”而是采纳了《大同世界》中译本中使用的“奇异性政治”这一命名。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Badiou, Alain. "Beyond Formalisation: An Interview." Trans. Bruno Bosteels and Alberto Toscano. *Angelaki: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8.2 (2003): 111-136.
- Balibar, Étienne. *Masses, Classes, Ideas*. Trans. James Swens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Brown, Nicholas, and Imre Szeman. "What is The Multitude?: Questions for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ultural Studies* 19.3 (2005): 372-387.
-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Trans. Wang Xingku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

sity Press, 2016.]

- *Assembl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Adventures of the Multitude: Response of the Authors." *Rethinking Marxism*. 13. 3-4 (2001): 236-243.
-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 Laclau, Ernesto.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 莫利兹奥·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9—152页。
- [Lazzarato, Maurizio. "Immaterial Labor." *Empire, Cosmopolis, and Modernity*. Ed. Luo Ga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2006. 139-152.]
- 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尉光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 [Negri, Antonio. *Art and Multitude: Nine Letters on Art*. Trans. Wei Guangji.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The Savage Anomaly*. Trans.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田延《从“政治美学化”到“美学政治化”——重读阿尔都塞的文艺评论》,《外国美学》30(2019): 210—231。
- [Tian, Yan. "From 'Aestheticization of Politics' to 'Politicization of Aesthetics': A Revisit of Althusser's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national Aesthetics* 30(2019): 210-231.]
- 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Virno, Paol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rans. Dong Bic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 曾军《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文学评论》1(2018): 14—20。
- [Zeng, Jun. "Mao Zedong's Aesthetics among Western Left-wing Trend of Thoughts." *Literary Review* 1(2018): 14-20.]
- Žižek, Slavoj.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责任编辑:王嘉军)